



包容性的 创新者

彼得·J.沃克关于耶鲁大学教授罗希尼·潘德的介绍，后者致力于研究完善的制度如何改善社会公平

1990年，印度政府宣布，将预留部分公务员职位录取低种姓公民，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和自焚等暴力活动。在安静的教室里，当时还是德里大学经济学本科二年级学生的罗希尼·潘德指出：“求职应该靠个人能力，而非特殊待遇。”

然而，两年后的一次全新经历改变了她的看法。罗希尼·潘德生于印度的特权精英阶层，成年后，她发现自己在牛津大学始终是个“外人”，尽管拿到了著名的罗德奖学金。

潘德在一次视频采访中表示：“美国求学者与亚洲和非洲求学者之间明显存在等级之分。对于相对贫困国家的求学者，他们来到牛津是为了接受本国无法提供的优质高等教育，而对于多数美国求学者，他们只是休两年假期，之后还会回到美国知名高校。”

这种失衡迫使潘德更深入地思考公平问题，她表示，从弱势群体的视角，她现在能对印度低种姓人的困境感同身受。

潘德表示：“与许多生于特权阶层的人一样，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特权的含义。”这段经历对她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她一直致力于理解制度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会的资料显示，现年49岁的潘德是“她这一代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她在政治经济学、国际发展、性别经济学、反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耶鲁大学南亚经济研究院主任夏洛蒂·泰勒·摩尔表示：“在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坚持探索的不仅是哪些措施能改善穷人的生活，还包括其背后的原因，其对‘如何构建制度框架’的启示，以及应当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2019年，潘德被任命为耶鲁大学亨利·J·亨利二世经济学教授兼经济增长中心主任。此前的13年里，她一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资深教授。任职期间，她联合创立了“政策设计依据”项目(Evidence for Policy Design)，该项目与发展中经济体当局合作应对政策问题。潘德因进一步提高女性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荣获2018年卡洛琳·肖·贝尔奖。

政治经济学

罗希尼的前同事、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表示：“多年来，我从罗希尼身上学到了很多。她主张的发展方法自始至终秉承着一个理念，即发展程度较低和弱势地位的根源既在于经济，也在于政治。”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潘德到伦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她聚焦于印度为增加少数群体政治代表性所做的努力，方法是在特定辖区仅允许低种姓人参选，这一政策被称为“政治席位预留制”。她发现，在邦一级，这一做法增加了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再分配，表明政治代表性和政策影响力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在后续工作中，潘德继续探究这种联系，聚焦于健全的政治制度对发展和扶贫的重要性。她最近指出，贫困问题能否成功解决，直接援助的影响不大，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确保弱势群体能推动其代表落实再分配政策。

她表示：“运转良好的民主需要的远不止是一种制度，赋予全体公民每隔几年参与投票的权力。关键在于，它要赋予公民知情权，避免民主制度被腐败所侵扰。”

对潘德而言，政治也关系到她本人。她的母亲姆里纳尔·潘德是印度知名的新闻工作者，近期，她因报道了一场大规模农民抗议活动，面临煽动暴乱的指控。

罗希尼表示：“要实现有效的民主制度，强有力的新闻自由制度必不可少。政客们将新闻自由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干扰，但没有新闻自由，政客们就会盲目行事，最终买单的是整个国家。”

质疑思维

有效的金融机构也对发展至关重要，潘德的工作就曾多次检验过传统智慧。

2005年，她与伦敦政经学院的罗宾·伯吉斯合著了一篇有关乡镇银行的论文，对当时的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论文指出，鉴于公共资金支持的乡镇银行无法盈利，其无法有效支持经济发展。

但研究人员表示，乡镇银行的设立宗旨不见得是盈利，而是为贫困家庭服务和缓解贫困。以这一标准来看，特别是在印度，乡镇银行实现了其主要初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代表团团长佩蒂特·托帕洛娃对《金融与发展》（F&D）表示：“这篇论文确立了银行信贷与减贫工作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潘德在哈佛任教时，托帕洛娃是赴哈佛访问学者，曾与潘德合作开展研究工作。

在小额信贷的相关领域，有观点认为，必须要求贷款人频繁还款，以防止发生违约。潘德对此提出了质疑。几年来，她聚焦于这些举措的主要目的，发现了采用灵活还款期的好处，包括降低交易成本、减轻借款人财务压力以及扩大商业投资。

潘德曾与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埃斯特·迪弗洛多次展开合作，挑战了有关水坝对经济发展的根深蒂固的作用。研究人员表示，水坝实际上会加剧当地的贫困问题，因为修建水坝会给当地带来混乱，导致民众无家可归，而穷人无法为此得到充分补偿。尽管下游地区的贫困问题能得以缓解，这种收益无法弥补水坝周边地区贫困的加剧。

这些研究成果触动了有些人的神经。一位世界银行高官曾向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问题高级研究员抱怨，这让后者感到可笑。潘德表示，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2005年前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分配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

迪弗洛表示：“罗希尼具有超越常人的同理心。她能理解民众生活的诸多方面，而这些问题我甚至完全没想过。从最初的直觉，到研究成果最终发表，与她并肩奋斗的漫长旅程是对我们合作最大的回报之一。”

性别政治

潘德与迪弗洛和托帕洛娃一起探究了政治代表性和性别问题。

十年前，她们开展了一项研究，即地方官员中的女性名额如何影响人们对官员工作成果的看法。印度在1993年修改了宪法，在地方政府内为

女性保留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从1992年到2005年，地方官员中的女性占比从5%上升至40%。

西孟加拉邦的比尔普姆主要由农村和贫困地区所组成，研究者在这里随机抽取了495个村庄，对7000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在每户家庭中，她们采访了一名成年男性，一名成年女性以及所有11—15岁的子女。

研究者发现，人们接触越多女性官员，对官员总体工作绩效的评价就越高。她们还发现，女性官员能提高父母对女儿的期望以及女儿的理想。潘德表示：“我们工作的长期影响在于，随着更多女性担任领导职务，人们的观念可能也会转变。”

尽管示范效应十分明显，但研究并未发现关于年轻女性享有更好的劳动力市场机会的证据。潘德表示：“有近1亿的印度女性表示，她们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机会。”有证据表明，她们宁愿工作，也不愿承担家务。

因此，潘德重点研究了妨碍女性就业的社会惯例。她表示，规避这种观念的一个方法是：允许女性掌管自己的薪水。

但潘德与南加州大学的西蒙·沙纳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不仅需要银行账户，还需要接受理财知识教育。

沙纳表示：“相对于只开设个人银行账户或不开设银行账户，为女性提供基础银行技能培训和直接存款服务，能提高其在政府福利计划和私人部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

在为《印度经济时报》旗下的《ET Evoke》撰稿时，潘德强调说：“同行网络可以建立一种认知，即女性有可以学习、依赖的榜样，并且可以判断出社会对女性工作的观念可能不像个人想象的那样消极。”

从腐败问题到气候问题

在潘德有关腐败问题的工作中，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本杰明·奥尔肯合作开展了关于腐败问题研究的评估和分析，驳斥了如下观点，即穷国更易于滋生腐败，因为民众的容忍度更高。该分析被各方广泛引用。相反，她们指出：“富国和穷国都有滋生腐败的可能性，区别在于制度。”这表明，政府

需要改善执政透明度，并强化控制机制。

对腐败问题的兴趣使潘德参与到气候问题的研究工作中。十多年前她结识了当时在哈佛大学攻读高管培训课程的艾米·亚吉尼克。亚吉尼克是古吉拉特邦污染控制委员会的一名律师，现任古吉拉特邦议会议员，她们探讨了难以获取可靠排放数据的问题。

潘德对此很感兴趣，她研究了如何通过解决排放主体和监管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来提高信息质量。潘德表示：“我对气候问题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对腐败问题的思考。”她与迪弗洛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迈克尔·格林斯通合作，通过调整激励措施以获取有关污染情况的可靠信息。

其中一条建议是，排放主体不得自行选择审计人员，而应由其他主体随机指派，按固定费率支付报酬，以防引发利益冲突。尽管该政策缓解了腐败问题，但她们的其他研究工作表明，此举存在潜在成本，即无法利用某些监测单位可能掌握的有价值软信息，这表明两种做法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取，优质信息都能对调节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潘德及其同事正在研究通过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减排的可行性，而持续监测中的创新活动能为此提供支持。

诸如此类的制度变革能够切实缓解气候变化。据潘德及其同事估计，只要在持续监测中进行创新，就有可能获取可靠完整的工厂排放信息，使减排总量增加30%。

潘德就气候变化问题与政策制定者进行了沟通，2019年，潘德通过哈佛大学的“政策设计依据”计划，帮助印度在古吉拉特邦启动了世界上首个颗粒物排放交易系统。

指导他人

潘德是一位尽心尽责的导师。在其学生向卡罗琳·肖·贝尔奖评审方提交的推荐信以及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中，都充满了往届和应届学生的感激和称赞。

哈佛大学教授纳塔莉亚·里戈尔就曾是潘德指导过的学生之一，她告诉F&D：“罗希尼的一切都不同凡响。里戈尔表示她待人的慷慨大方，

学术圈内无人能及。”她指出，在发表学术论文时，潘德会将所有参与人员都署名为作者，无论其资历深浅。

为确保女性能舒适地从事经济学研究，潘德运用了在制度方面的专业知识。她建议消除刻板印象，接纳不同视角和观点，将求职者的评估要求标准化，并更多关注女性榜样。潘德强调，保证每个系列讲座至少有一名女性发言人非常重要，并曾威胁对性别构成不够均衡的会议进行抵制。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称潘德是他们的精神偶像；他们联名请愿，移除了经济学院入口处悬挂的多幅白人男性教授肖像。而潘德则将哈佛大学的克劳迪娅·戈尔丁和耶鲁大学的佩妮·戈德堡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

为确保女性能舒适地从事经济学研究，潘德运用了在制度方面的专业知识。

尊重是相互的。戈尔丁说道：“罗希尼作为教师的慷慨、作为导师的奉献精神，以及慷慨地给学生提供各类公共产品（包括美食），都令我印象深刻。”而戈德堡则引用潘德的话来评价她：“站在研究前沿，致力于社论文章，引领着耶鲁经济增长中心”。

一项名为“包容经济学”的新倡议为潘德的贫困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聚焦点。该组织由潘德和查瑞蒂·特罗耶·摩尔领导，总部设在耶鲁大学，利用数据驱动的方法，致力于寻找穷人增强自身影响力和争取应享增长红利的方法。

潘德表示：“不平等加剧和制度式微（尤其是民主制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自然环境对增长的约束会进一步加剧恶性循环。什么类型的体制改革可能帮助我们扭转恶性循环，形成制度日益完善、社会日益平等的良性循环？”^{FD}

彼得·J.沃克，《金融与发展》职员。